

郭沫若 研究

7

文化藝術出版社

郭沫若研究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郭沫若研究》编辑部编

7

文化艺术出版社

郭沫若研究

第7辑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郭沫若研究》编辑部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印张 9.625 字数 230,000 插页 2

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440册

ISBN 7-5039-0400-3/I·222

定价: 4.15 元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

林 林

副主编：

黄侯兴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世民 朱成甲 李福田 林 林

周自强 秦 川 高国平 黄侯兴

彭静中 雷仲平

本辑责任编辑：

蔡 震

DC84/37

目 录

“郭沫若在日本”学术讨论会

在文化审视中拓宽研究领域·····	林 林 (3)
在新形势下的期望·····	夏 衍 (14)
把郭沫若研究深入下去·····	阳翰笙 (16)
深入郭沫若研究的浅议·····	马识途 (19)
论郭沫若与儒家文化·····	邓牛顿 (25)
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交流论纲·····	杨炳昆 (39)
郭沫若研究的现状应当改变·····	谢保成 (51)

文 史 研 究

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	王富仁 (63)
-------------------	----------

——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

不同时代的心态转换·····	吴 进 (83)
----------------	----------

——郭沫若与新诗潮诗人比较观

人文主义的浪漫式觉醒·····	姜 铮 (96)
-----------------	----------

——论《三叶集》中的郭沫若思想

五四文化论战与郭沫若前期史剧创作·····	周海波 (114)
-----------------------	-----------

审美理想的信息载体·····	冯乐堂 (126)
----------------	-----------

——论郭沫若历史剧中为正义和理想而牺牲的悲剧女性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人物特质·····	冯 奇 (137)
-------------------	-----------

论郭沫若史剧创作中的情感和思维·····	靳明全 (151)
----------------------	-----------

郭沫若的审美观与楚文化·····	胡志毅 (161)
------------------	-----------

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论刍议 (下) ·····	黄淳浩 (171)
-----------------------	-----------

· I ·

郭沫若与闻一多	萧远强(186)
评《评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	耿铁华(224)

资料·佚文

致张明仁(一函)	郭沫若(243)
致陈铭德、邓季惺(一函)	郭沫若(244)
致池见酉次郎(一函)	郭沫若(245)
致柘植秀臣(一函)	郭沫若(246)
致尹达信附函	郭沫若(247)
普罗文艺的大众化	麦克昂(250)
神明时代	郭沫若(254)
历史与人生	郭沫若(257)
鱼跃鸢飞意 塞云千里黄	张介民(263)
——记郭老赠予的题画诗	
郭沫若素描	〔日〕增田涉(266)

国外研究

郭沫若与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	〔日〕向坂逸郎 田家农 译(281)
从浪漫主义到马列主义1918—1924	〔美〕戴维·托德·罗伊 晨雨 译(286)
编后记	(304)

“郭沫若在日本”学术讨论会



在文化审视中拓宽研究领域

林 林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郭沫若在日本”学术讨论会，今天开幕了。我代表学会向与会的郭沫若同志的生前战友，向各位学者、教授、大专院校教学工作者和郭沫若研究工作者，向各位会员代表和其他来宾，向新闻出版事业单位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同时，让我们借此机会，向先后逝世的学会名誉会长成仿吾同志、冯乃超同志，副会长石西民同志，理事孙席珍同志、鲁歌同志，会员王锦泉同志，表示深切的悼念；向生病住院的我们敬爱的会长周扬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

再过一个月，就是郭沫若同志逝世十周年。此时此刻，我们聚集一堂，深情地缅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学者和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很有意义的。鲁迅说过，死人倘不埋在活人心里，那便真正死掉了。郭沫若是不朽的，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五年前，当郭沫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它的宗旨最根本的就在于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郭沫若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五年来，我们学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著作编委会，以及广大郭沫若

研究工作者的支持和关心下，在其他兄弟学会的帮助和协作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我们这次会员代表大会就是要报告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修改学会章程，选举第二届理事会。

1985年10月，在重庆召开“郭沫若在重庆”的学术讨论会期间，曾议定郭沫若逝世十周年时，举行一次题为“郭沫若在日本”的学术讨论会。后又经常务理事会商定，这个学术讨论会就紧接着安排在这次会员代表大会之后，在北京召开。

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修订稿）已经印发给各位代表，我在这里谈谈个人对郭沫若研究的一些意见和设想，供大家参考、批评。

郭沫若研究无疑是现代文学和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建国后的研究是薄弱的，同我国近现代文学、史学的研究比较起来，差距是较大的。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同志逝世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报刊上，雨后春笋般地发表了大量纪念、回忆郭沫若同志的文章，也出现了一定数量和质量学术论文，还有少数研究专著。这种情形持续了两三年，它表示了郭沫若研究的新态势。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就是在这种情况的推动下成立的。

学会成立后郭沫若研究的状况应该怎样估计和评价呢？我以为，可以简括地这样说，从1978年到1983年的五年，是层面较为铺开的五年，从1983年至今则是开始深入发展的五年。我这样估计的根据是：

一是研究队伍扩大了，单从学会会员的数量来看，学会成立时，会员只有100多人，而今天已经发展到了270多人，还涌现出一批尚未入会的研究者，特别是一些大专院校中文系、历史系的年轻的研究者，投身到郭沫若研究的队伍中来，使研究队伍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二是研究领域扩大了，视野开阔了。不仅有文学的研究，而且有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对于作品、著作的研究，而且有对于革命实践、生活道路、思想发展，以及拓宽到郭沫若与中西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不仅有纵向发展的研究，而且有横向比较的研究；乃至某些过去视为“禁区”的领域，也开始有人涉足了。

三是研究成果质量明显提高。近年来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某些研究领域还有所开拓；研究者一般都能比较自觉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始纠正过去某些研究中或者失实、或者片面的缺点。

四是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譬如对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问题，人道主义思想问题，郭沫若文艺创作的得失问题等，研究者们各抒己见，进行探索、讨论和争辩。

五是研究观念和方法正在变化和革新。许多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他们不满足于研究的现状，强烈要求有新的、大的突破，因而正在力图用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来从事研究的工作，改变过去某些框框和模式。

六是一般社会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们，正在摆脱某些偏见，要求全面地、正确地了解、认识和评价郭沫若；大专院校中文系也较过去更为普遍地开设了郭沫若专题课，而且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总的说来，郭沫若研究的状况和形势是令人欣慰的，它正在逐步走上科学的历史轨道。这使我们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的郭沫若研究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少的。我们的人力、物力都极有限；如何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同改革、开放的形势适应起来，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需要有一个摸索和认识的过程。从主观讲，我们自身的科学文化知识素养也有很大的局限，因而还难于完全适应或胜任对郭沫若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人物的研究。我们在这位

文化巨子面前只得常常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心情，同时又感到我们面前任重而道远。

举行“郭沫若在日本”学术讨论会，目的就是巩固这几年的研究成果，交流这几年的研究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把郭沫若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使它不致停滞在或徘徊在已有的水准上。

郭沫若在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创作和著述的生涯中，有整整两个十年是在东邻日本度过的。这两个十年，如同他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一样，也是他一生中两个极其光辉的时期。继“郭沫若在重庆”学术讨论会之后，我们又选择“郭沫若在日本”这样一个课题来讨论，我以为是富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日本是郭沫若吸收世界文化的桥梁，他在这里与世界文化取得了广泛的精神联系，他接触了德国的歌德、席勒和海涅，英国的雪莱、拜伦、莎士比亚，荷兰的斯宾诺莎，美国的惠特曼，印度的伽毕尔、泰戈尔，以及北欧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还有日本的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等，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他们的影响。郭沫若站在笔立山头展望世界文化，使他有可能在涉足文学的伊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当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正在日益广泛交流的今天，我们认真总结、借鉴包括鲁迅、郭沫若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宝贵经验，意义显然是重大的。

说到郭沫若在日本的第一个十年（1914—1923）即他留学日本的时期，我们学术界的同志首先便会自然地想到他的《女神》。我们年纪大一些的知识分子，当年凡是喜爱文学的人，可以说是没有不喜欢《女神》的，没有不被《女神》所激动过、震撼过的。现在许多学者承认《女神》是“五四”新诗的奠基作品。如果说，从近代的谭嗣同、黄遵宪等倡导“诗界革命”，到胡适的《尝试集》问世，基本实现了旧诗向新诗的过渡；那

么，郭沫若的《女神》则以崭新的思想与形式跨进新诗的王
国，它作为中国新诗的第一块丰碑是当之无愧的。

《女神》仍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于如何深化这种研究，
改变过去那种孤立的、单一的研究格局。这就有必要反观历史，
认真研究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研究西方
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刻
的历史内容和历史局限，研究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五四”先驱
者的地位和成就，他们不同的经历、气质所显示的各自的文化
素养与特色，他们在继承、借鉴中外文化遗产中所表现的创造
精神，以及对于推进、扩大中西文化交融方面各自所做出的历
史贡献和存在的偏颇等。如此宏观的、系统的研究，而且从文
化的视角即以文化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文学——诗歌，从中探
索《女神》等作品富有审美意义的文化价值，我相信《女神》
研究的内涵会更丰富、更深刻。

郭沫若留学期间，正处于早期世界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这从《女神》里也有许多反映。更早的时候，他受到孔子、庄子、
屈原、司马迁、李白等的思想影响，到日本后，他学习医学，既
学得了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到了多种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文艺
作品，还接触到了东西方的各种哲学学说和文艺思想。在中西
文化处在交融、撞击的时期，郭沫若的态度是积极、辩证的，他
一方面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要“吮吮欧西的
纯粹科学的甘乳”。他认为在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变
化的“新时代”，这些问题要在中国青年中间造成一个“普遍的
明了的意识”。在欧美各国科学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二十世纪初
期，郭沫若已经意识到，要想恢复我国固有的创造精神，关起
门来孤立地进行建设是不可能的。他在《一个宣言》^①中说：

① 《文艺论集》。

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

我们应该针对着前面的灯台，开始我们的航路；

如今不是我们闭关自主的时候了，输入欧西先觉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意图。

我们要宏加研究、介绍、收集、宣传，借石他山，以资我们的攻错。

郭沫若在强调吸吮西方科学文化时，是把握了历史批判精神的，他的基本态度是“要善于利用科学文明而不受资本主义的毒害”。这些思想，既顺应时代的潮流，又具有郭沫若自己的清醒的、奋进的意识，是很可宝贵的。我们现在重读郭沫若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文章和创作，如果能从郭沫若当时的文化意识——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的认识、他的文化心理特征这个更宽广的领域去探索、观照他的文学活动和创作，他从《女神》到《星空》所流露的复杂的波荡的思想、情绪，我想会更精彩，更能发掘内涵。总之，我们只有在历史、哲学、艺术、宗教、伦理学等领域去了解郭沫若早期对待中外科学文化的态度和主张，才可能更全面、深刻地研究郭沫若留日阶段的文学思想和创作。

此外，我还想说，我们过去在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鲁迅对我国国民精神弱点的深刻批判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并取得了成绩；但是对于郭沫若这一方面的思想研究，却几乎还是空白。其实，郭沫若在他的早期文章中，对于汉武以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久困在涸辙中”的国魂，对于我们民族已经消涸了的“创造的灵泉”，对于我们民族麻木、迂腐、儒怯、自私的精神品格，都不断有所揭露与抨击。他在讲到天才与教育的问题时，批评了“素来注重实际而唯小利是图的中国人”，只会产生“恶魔的天才”。他说“素来是道义丧尽的民族，我们怎能

望他发生伦理的天才？素来是不尚逻辑的国家，我们怎能望他产生出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尤物？更说到狭义的天才——文艺方面的天才上来，我们中华民族是可怜到十二万分了！美的观念麻木了的国民，象我们中华民族一样的，恐怕世界之中没有两个！”^①有些话可能过于偏激，但它是针对国民劣根性而言，总的看来讲得尖锐、深刻，切中要害。如果我们对郭沫若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也能作一番研究，并且把它同《女神》鼓吹的凤凰更生、自我更生、民族更生的观念贯通起来加以考察，我相信，郭沫若研究就有可能在更深的层面上掘进。

我还想说一下郭沫若在1924年春夏之交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事。郭沫若翻译这本书的动机，首先是由于“对于社会科学的憧憬”^②通过翻译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即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这本书的翻译，成了郭沫若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换的契机，是他投笔从戎、参加大革命的一个思想条件。我们研究郭沫若在日本的前十年，也不妨从哲学思想上去考察包括河上肇在内的外国哲学家对郭沫若的深刻影响。

讲到第二个十年（1928—1937），大家知道，郭沫若在日本的十年亡命生活中，自觉地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姿态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特殊的斗争，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如果说，在第一个十年里，他还只是一位诅咒黑暗、讴歌光明的诗人的话；那么，在这第二个十年里，他就是一个自觉地战取光明的战士。

这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有了依归，正确解决了生死观问题，在极其险恶的处境中，在极端贫困的生活里，他置生死于度外，

① 《文艺论集·天才与教育》。

② 《创造十年续编》。

置危难于不顾，随时准备以自己的生命去殉崇高的事业。他的献身精神来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出自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所以，他能十年如一日，维护一个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和革命者的忠贞气节。“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遭其厄，愧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①郭沫若在失去行动自由时，已经站稳了自己应该坚持的立场，他以顽强的意志，潜心治史。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史。他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开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河。他把古史的研究和古文字的研究结合起来，使古史研究具有可靠的史实基础，使古文字的研究达到了科学的高度。他所撰写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皇皇巨著，在创通体例、革新方法、释证疑难等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以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结果，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完全可以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观是相吻合的，从而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是适用的。他以丰硕的研究成果，有据、有理、有力地批驳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者”李季、陶希圣等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非难。

有人说，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到日本隐居起来了，钻进故纸堆里去了。这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他的心始终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及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1929年，郭沫若为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根据滨田耕作的日文译本，重译了德国亚多尔夫·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一书。他想把美术考古学这门学科介绍给

① 《金文丛考》。

国内学人，虽然估计读者不会很多，但他认为对于国内研究者了解考古学在欧美各国和日本取得的进步是有益的。他在序文中说：“中国落后，自然一切都很幼稚，但落后者也有它的便宜，便是可以借鉴于他人，采取最妥当最捷便的道路，而免得作种种暗中摸索与种种无意识的错误与迂回。政治上的道路是这样，学问上的道路也是这样，我们把先进者的最新的方法采用过来，我们所得的利益不仅是事半功倍。”^① 他的著译，都有着较明确的现实目的性，都是为着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而进行的创造性的劳动。

总之，郭沫若在这两个十年中奉献给我们民族的，既有有形的作品和著作，也有无形的智慧和精神，两者都是无价的珍宝，它们是足以使我们自豪的。把郭沫若造就成诗人、学者和战士的，是那伟大的时代。凡是时代的产物，必受时代的局限。郭沫若也不例外。这便是我们今天需要全面研究他的原因所在。

关于今后郭沫若研究该如何开展，我还没有成熟的想法，在座诸位都是研究的内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相信大家一定会在讨论会上畅抒己见，以集体的智慧制定出一个好的研究计划来，用丰硕的研究成果迎接郭沫若同志诞生一百周年。我想讲几点设想，希望能够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倘有不妥，请大家批评。

第一，我建议今后要特别注意宏观方面的研究，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很好结合起来，使宏观不是架空，微观不偏一隅。我们过去研究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微观方面，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同时进行宏观研究，不在宏观上去把握，微观研究方面可能会失去“系统”，会造成只见朵朵的浪花，不见

① 《〈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者序》。